



百年中国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综述

萧 红 袁 媛

摘 要:百年来,中国道教文献语言研究从前期以考据为主的文献语言研究发展到后期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由强调经验研究到开始注重理论的系统性,逐步成为一门交叉学科。与佛经语言研究相比,道教文献语言研究存在着起步晚、数量少、根基浅等明显差距,但未来在学科发展、材料利用、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道教;语言本体;道藏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指的是有关道教文献语言各层面(语音、词汇、语法)、符篆文字、语用修辞等的研究。20 世纪初刘师培、陈寅恪、汤用彤等学者为道教典籍语言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此期的研究多为自发性质,属于“文献语言学”的研究。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传统的变迁,道教文献语言研究逐渐发展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强调经验研究,并开始注重理论的系统性。我们试图对百年来道教文献语言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文献语言学研究阶段

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学术风气亦为之丕变,反差之一是文学的衰落与国学的勃兴。国学中的“义理之学”包括道教研究,如清代惠栋等笺注《太上感应篇集传》(1900),这是道教研究走出宫观步入学界的嚆矢。

卿希泰在整理道教研究史时虽然把 1900—1978 这一段将近 80 年的时间以 1949 年为界划为两个阶段,但他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好截然划开……都只是一个起步的时期,同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①,也就是卿氏是偏向于把 1900—1978 作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阶段的;朱越利和卿氏的主张基本一致^②。根据实际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同时参照卿、朱二人对道教研究史的划分,我们把 1980 年以前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

虽然义理与辞章、考据鼎足为三,但我们在本阶段发现,不管道教研究的前辈宗师们学术成就如何,首先他们都是文献考据的行家里手。这是因为“国学传统中的核心研究范式为考据学”^③。葛兆光(1999)认为 1950 年以前的宗教史研究可称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80 年代以前是“哲学史研究阶段”,并指出在前一阶段,“他们把欧美的实证主义的理论、语言学与文献学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和清代考据学传统结合起来,对中国宗教

① 卿希泰:《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卿希泰:《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研究》,巴蜀书社 2007 年,第 511 页。

② 朱越利:《三十七年来的道教学研究》,载汤一介:《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513~534 页。

③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6 期,第 118 页。

史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①。王卡(2007)把近百年的道教研究定性为“文史学研究”^②。我们认为,1980年以前的道教语言研究主要形式是文献考据,可划归“文献语言学”,研究成果集中在对《道藏》和部分经书的整理、注释与考订方面。

本阶段学者们对部分先秦道家和中古近代道教经典、道教专业词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既体现出传统训诂学的深厚基础,又显现出现代科学精神,注重与出土文献比较。

对道家经典尤其是《老子》(《道德经》)的注释和论述成果斐然,有30余部。另外,罗振玉、唐文播、蒙文通等围绕道家出土文献如《老子》诸写本和《南华真经》的校勘对道教文献的深入研究亦十分有益。早期道教经典如《太上感应篇》、《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周易参同契》、《太平经》、《阴符经》、《黄庭经》、《真诰》等著作的整理、注释、考订的论文比较集中。王明《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在当时就能以汉代语言作为检验标准之一来考察《太平经》一书的成书年代,尤为可贵。

敦煌道经的发现唤醒了学者的自觉比较意识,利用敦煌道教文献与传世道教文献比较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1934.4)利用了法藏敦煌本《化胡经》的卷一、卷八和卷十,与传世文献相比较。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大学,1956)将伦敦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全文录出,兼作校对、笺释和阐明其中的原始道教思想,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近代道教著作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丁谦、王国维等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考证。

另外,此期有张竹铭、陈樱宁、汪伯英等一批爱国好道人士,他们以弘教为目的,在沪创办《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对常见道经如《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注》等进行解读。其解读经义力求浅近,仍然采用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注解、考释、校补等,可归入文献语言学。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研究

从宏观的学科背景来看,汉语史学科由奠定到发展,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始,学科分工精细化,分析方法也日臻发达,在经过一段相对密集的儒典佛典语言研究之后,道教文献语言的研究主体由哲学宗教学者逐渐让渡给了汉语史学者,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成为汉语史向纵深发展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这一阶段的研究包括三方面:文献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本体研究;语言的应用研究。其中文献语言学承继上期的考据范式,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石。语言本体研究占据主流,包括以下几类:道教语言哲学理论、符号学观照下的道教语言研究、以语言为主体的道教文献语言研究(包括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和其外围的语料整理)。

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巴蜀书社,2001年)是第一部以自觉的“语料”意识整理的道典校注,也是传统考据和现代理论结合的典范。道教文献语言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展,不再限于先秦道家文献语言,扩展到中古以及近代道教文献语言各层面。不过,与佛经语言研究相比,道典语言的本体研究在各层面的发展上都不够充分,且不均衡。其中,成果最丰的词汇研究在延续前期文献语言学词语校释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突出了对语言本体研究的侧重,即词汇史的视野,但与佛典词汇研究相比,其范围较小,深度也不够。语音、语法、文字方面仍然积弱。在道典语言的应用研究方面,从传播学角度对道教文献展开的研究颇为可喜。

(一) 文献语言学研究

为便于对道教文献的研习,本阶段编写了不少关于道教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的索引。如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施舟人著、陈耀庭改编的《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上海书店,1996年),朱越利《道经总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此外有杨光文《全国部分报刊道教论文索引1905—1983》,《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5辑《宗教研究论集》,

① 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载葛兆光:《屈服史及其它:六朝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第204页。

② 王卡:《道教经史论丛·后记》,巴蜀书社2007年,第527页。

1984年),吕鹏志《道教仪式术语索引》(《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附录,中华书局,2008年)等。

在传统的文献语言研究中,词语考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是对道教出土材料的考释:

对镇墓文等出土材料的考释。罗振玉是第一个专门搜集并著录镇墓文的学者。随着越来越多的道教文物的出土,20世纪80年代初期道教研究成果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考古界学者对新材料文本的考释。如陈直《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4)、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1)等二十余篇。

道典词语考释。对道教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考释肇始于宗教学者,他们多通过关键词语的考释来透视词语背后的思想文化特质。如朱越利、王卡、葛兆光、李刚、龚鹏程、陈国符等对道教术语词的研究。其中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专门研究炼丹类道经语词的专著。全书共考明道教炼丹术语、词谊319项。”^①陈氏在词谊考证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研究方法——“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

继而汉语史专业的学者们加入其中,由于他们具有词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够系统观照词语个体,使得词语考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俞理明、王云路、方一新、连登岗、王敏红、冯利华、王磊、刘祖国、叶贵良等学者围绕《太平经》、《抱朴子》、《云笈七签》、《真诰》、敦煌道经等道教典籍词语的考释成果颇丰。其中关于《太平经》的研究最完善,后续成果最多。

(二) 语言本体研究

1. 道教文献语言形式及风格探讨

和国内修辞学科二分的研究格局相应,道教文献语言形式及语言风格方面的探讨有两种趋势:语言学界集中为对先秦道家老庄文本语言艺术和修辞格的探讨;文学界用的是另一套话语,如葛兆光较早提出“道教的语言风格”这一论题,比较了道教与佛教不同的语言传统,认为道教语言文字偏向于墨守甚至复古^②,道教语言的特点是“一面是追求古奥艰涩,但另一面是尽量流彩溢金”^③,其分析长于对道教文献的整体把握,带有明显的文艺学特征。

从整体而言对道教文献语言风格的归纳未成系统,该领域似乎最有希望走一条学科融渗之路,以语言学作为学理支撑,同时注重整体的风格把握。

2. 符号学观照下的道教文献语言研究

“广义的宗教语言,不仅包括在宗教的典籍和各种宗教性质的活动中,信仰者之间彼此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且还包括实物符号和动作、行为符号,这些都可以视为‘宗教语言符号’”^④,而道教尤擅制造和运用这些宗教符号。本期研究的一个突破就是在西方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的视野扩大到广义的道教语言符号如符咒、科仪、手印、斋醮等,涌现了一批专著和单篇论文。

詹石窗是较早自觉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道教符号的学者之一,著有《道教艺术的符号象征》(《中国社会科学》,1997.5)等。还有萧登福、刘晓明、冯利华、方新蓉等对道教符篆、咒语、隐语所做的探讨。教内人士任宗权著有《道教手印研究》、《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和《道教科仪概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2006、2006年)系列著作,为研究道教手印、章表符篆和科仪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 以道教文献为语料的语言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文献成为继传统儒典、佛典之后的又一研究热点。俞理明、周作明《论道教典籍语料在汉语词汇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4)提出在汉语史研究中应重视对道典语言材料的研究和利用。冯利华亦有多篇论文关注道经音注、词汇与俗字研究。对具体道书如

①叶贵良:《敦煌道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5页。

②葛兆光:《“神授天书”与“不立文字”——佛教与道教的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第37~49页。

③葛兆光:《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词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载吴光正:《想像力的世界——20世纪道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④魏博辉:《打开信仰者心灵的钥匙——论宗教语言的象征性》,载《中国宗教》2010年第1期,第45页。

《太平经》、《真诰》的语言学价值,冯利华、徐望驾、高明、黄平之等都作了较高评价。

本阶段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独立性增强,语言成为研究的主体,在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学者展开研究,但由于参与度不一,取得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也不一致。

(1) 语音

《道藏》中有丰赡的音释类著述材料,对训诂学、汉语语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音释材料开展研究。前者如汪业全《〈道藏〉音释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论,2001)、杨荫冲《〈道藏〉音义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等,注重考正,兼及音义,归纳道书音注特点;后者如冯娟、杨超《陈景元道藏音注研究——有关声母系统的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等,注重参互比较,归纳音系。

一些道家、道教经典以及道士的诗文作品具有韵文特点,学者们考察其用韵,总结道教文献所反映出当时的语音特点,有时结合现代方言考察文献的韵部和声类,其成果对汉语语音史、方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关于《老子》、《周易参同契》、《真诰》、《黄庭经》、《上清经》、《灵宝经》、金末道士侯善渊诗词等用韵的研究。

(2) 词汇

相对于传统的词语考释来说,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研究已经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摆脱了片面求索单个词义的弊病,着眼于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有些论文吸收了现代语义学的最新成果,从新的视角来研究道经词汇。

道教专书词汇研究的语料覆盖《太平经》、《抱朴子》、《神仙传》、《周氏冥通记》、《玄怪录》、北朝道经、敦煌道经等,研究专题包括复音词、构词法、反义词、同义词、词义演变等各方面,研究方法亦各有专擅。如刘祖国《〈太平经〉词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论,2009)将《太平经》中的词语放到整个中古词汇史的背景中,并结合其他道经进行比较研究。叶贵良《敦煌道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博论,2004年)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角度对敦煌道经语词的来源、系统、构成及其词义的演变进行分析。周作明《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经典行为新质研究》(四川大学博论,2007)把上清经的词汇分别纳入名物性质、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三个词群范畴下考察。道教断代语言研究立足于专书研究,提出了更宽广的研究构思。如俞理明《东汉佛道文献词汇研究的构想》(《汉语史研究集刊》第8辑,巴蜀书社,2005年)提出利用东汉佛道文献寻找词汇新质。

道教的宗教意识往往以语言为载体,渗透到其它文献中。不少有关中古近代佛典、医书、变文、小说、碑刻等的专书语言研究论著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道教语言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较多阐述。如祖生利、刘进、郭颖、吕志峰、周文、敏春芳等学者的博士论文。

总的来说,词汇研究的大多数论著专注于分散的原子式研究,最近几年有了整合的新动向,如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2007.2)选取《齐民要术》和《周氏冥通记》作为北方、南方词汇的代表,通过比较来揭示南北朝时期南北方言的词汇差异。

(3) 语法

道教文献专题语法研究涉及词类和句法两方面,其中词类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等。

专书语法研究成果以《太平经》最为集中,在6篇做道教专书词类研究的硕士论文中,研究《太平经》的就有3篇,其它3篇道书词法研究成果是有关《真诰》、《抱朴子》的词法研究。语法研究中全部或部分语料取自《太平经》的单篇论文也比较集中。断代语法研究有李素英《中古汉语语气副词研究》(山东大学博论,2010)、周建姣《东汉砖文虚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论,2006)等,后者的研究语料从传世文献扩展到出土文献。

随着道教语料的“回归”,受到词汇领域整合走向的启发,语法学也开启了整合之路。萧红《六世纪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长江学术》,2010.4),即选代表南方特点的道教语料《周氏冥通记》与代表北方特点的《齐民要术》对比,探讨六世纪汉语人称

代词的地域特点。

（三）语言应用研究

道教语言的应用研究包括道教语言的传播研究、道教辞典和工具书的编纂两方面。

多种现代学科理论如传播学、社会语言学等的综合运用为道教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曾维加《道教传播中的语言媒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运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了道教的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两种传播媒介的特点、作用、局限性及其发展规律。张崇富《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4)讨论了上清派经典的语言策略为“黯易其字、隐晦其辞”,多用比喻、象征、指代手法。

影响较大的道教辞典有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收词目15000余条,共计500余万字,是多年道教研究成果的重要汇总,“重在全面介绍道教文化知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①闵智亭、李养正编《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4年)从道教经书中摘选道教常用词、术语、短句等汇集近2万个词条,“其典以解畅经旨为重,带有宗教学术的色彩。”^②

三、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道教与中国的儒、佛两家并称“三教”,关于佛、道二家在中国的流行,任继愈对此分析得最为精辟:“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舞台上。但道教的命运不济,错过大发展的时机,让佛教占先了一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2000年间一直没有能超过佛教。”^③道教的教派发展不如佛教,学术研究上也让佛教研究占了先机。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冯利华、李双兵(2006)有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道藏》作为道教思想文化的体现,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原始材料。从对道教研究的历史和现况来看,人们主要着眼于挖掘《道藏》中的道教宗派源流、教义教规、人物传略、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术、文化艺术及名山宫观的考察,即忽略了它作为语言材料所包涵的研究价值。即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仅局限于早期的《太平经》或者择取道书中具有小说特征的单篇书文予以研究,很少有学者把道经作为断代语言研究中的考察对象。”^④据葛兆光的分析,道教和文学(包括语言)的关系被忽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道教偏偏词汇又非常隐晦、深奥,隐语极多,这使得很多研究者很难深入这一领域”^⑤。

我们认为,道教文献语言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道教文献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和儒典、佛典的语言研究相比,道典语言研究可谓“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先天不足”是说道典原教旨自诞生之初就面临来源混杂、归系不明的问题,衍生的笺疏校注也不如儒佛二派那样详赡宏富;“后天不良”是说道典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学术研究视域之外,传统研究程度不深,成果不足,使得进一步研究成为空中楼阁。对照佛经语言研究,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起步晚。周俊勋(2009)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汉译佛典语言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并在文中指出,早在1889年,Watters Thomas在《汉语丛谈》中就谈到了“佛教对汉语的影响”,分析了汉语中一些佛教词汇的来源;周一良也于1947年前后明确提出“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佛典翻译文学”,并论及佛典语料词汇的价值^⑥。与此相比,现代意义上的道教语言研究的提出晚了几乎一个世纪。

数量少。据帅志嵩等编著的《佛教汉语论著目录1980—2006》(朱庆之主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对大陆学者在境内外以及其它学者在中国大陆期刊(包括以书代刊)公开发表的佛教文献语言研究成果的不完全统计,共计649篇。我们对1980—2006期间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成果作了统计,共计118篇,数量不及佛教文献的1/5。学位论文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管锡华(2006)对1980

①牟钟鉴:《千古文化一代大典——评〈中华道教大辞典〉》,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78页。

②牟钟鉴:《千古文化一代大典——评〈中华道教大辞典〉》,第78页。

③任继愈:《道教与中国思想文化——〈道藏提要〉序》,载《任继愈自选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431页。

④冯利华、李双兵:《六朝道经词语研究发微——以古上清经为中心》,载《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第150页。

⑤葛兆光:《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载《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0页。

⑥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2009年,第291页。

年以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作的统计,“子书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宗教文献占较大比例,专书与具体语料共13种13篇,而且有12种12篇是佛教语料研究,1种1篇为道教。”^①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差距于此可见一斑。

根基浅。佛教文献语言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进入精深研究阶段。目前的汉语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中梵汉对勘研究和佛经词典编纂成为热点。道教文献语言研究尚处于初期,除《太平经》、《抱朴子》等道书外,其余道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尚为空白。“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以儒、释、道为主要支柱的多元并存互补的格局,忽视甚至排除掉任何事实胜于雄辩,都无法全面客观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精神,无法做出公允客观的定位和评价。”^②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未来任重而道远。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一是学科正名。孔子强调“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学科名称实际上涉及到学科定位的问题,而这是一个事关学科方向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现有的道教文献语言研究迫切需要“正名”,以建立学科规范,明确学科地位和学科使命。刘祖国(2010)首次提出“道经语言学”的概念,并初步论述了建立道经语言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道经语言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③。但这一名称由提出到最后确定仅靠一人之力很难完成,尚需学界的进一步商讨。该文的一些说法不无商榷之处,刘界定“道经”范围包括“道教成立以后道士假托天尊、道君、祖师等神仙降授的道经以及与之相关的戒律、愿文、类书、义疏等道教作品,不包括先秦、两汉的道家著作,也不包括占卜书、星象书、医书以及其他类似道经的杂书。”这一界定把道家著作排除在外是可取的,但范围似嫌窄狭。王卡先生曾经总结过道教研究和取证的三大基本文献群:“《道藏》及藏外经书、敦煌抄本和碑文资料”,另外还包括“利用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如解注文、墓志、造像)和田野调查资料(如民间道士使用的劝善书及科仪文本)”,并强调说:“中古、近古时段的天道教经典及历史是重点研究课题。”^④这还仅仅只是“基本文献”,而我们的语言研究早已跳出“文献语言学”的小圈子,所以应该对照“宗教语言”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确定道教语言的研究范围,我们认为“道教语言研究”这一命题更为妥当,研究对象也相应调整为以道教基本文献为主,辅以考古资料、田野资料、各种实物符号和行为符号这样一种立体格局。

二是加强基础研究。道教语言研究的基础相当薄弱,首要的困难是语料的搜集和整理。任继愈先生(1991)指出:“道教和其它宗教一样,着重宣传神的启示,自称他们的经典为神仙颂赐。他们善于制造文书以宣达神意。”^⑤道教不仅文献资料浩繁,而且许多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真伪难辨,研究者须花费相当大的功夫进行考辨。未来只有在宗教学者、语言文字学者、文献学者等的共同努力下,加强原始道教文献的整理和解读工作,做好辨析源流的基础工作,才能真正迎来道教语言研究的新局面。

目前亟需对整部道藏作一个筛选,可以优先选择那些口语程度高、文本来源可靠、深入反映社会生活、篇幅相当的道书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如对《太平经》等的综合研究就是很好的范例。可由道书的专书专题研究入手,逐步开展断代研究和道经语言文字的历史演变研究。

另外,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离不开电子语料库的建立,道教语言研究要步入先进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快车道,道教文献电子语料库的建立必须先行。目前学界在语料库的建设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相信借助于日渐成熟的全文检索技术,大型道教电子语料库将在语言研究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还有,现有的道教词典所释多为道教专用词,对于道教文献中的普通用词收释很少。未来随着道教语言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可先行编制道教文献词语索引,并逐步过渡到编写专经词典,收录道教用词和古白话口语词条,以补《汉语大词典》之不足。

三是研究方法的改进。道教语言研究是处于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王卡先生总结近现代的道教研

① 管锡华:《1980年代以来大陆古汉语词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综论》,载《汉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25卷第1期,第16页。

② 傅凤英:《二十世纪中国道教学术的新开展》,巴蜀书社2007年,第277页。

③ 刘祖国:《试论道经语言学》,载《船山学刊》2010年第3期,第161~163页。

④ 王卡:《道教研究》,载卓新平:《中国宗教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44页。

⑤ 任继愈:《道教与中国思想文化——〈道藏提要〉序》,第433页。

究方法时曾提出新旧范式之别，旧范式指“文史学研究”，新范式则随着考古新资料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的发现，转为一种对“实践中的道教”的研究^①。语言研究情况稍有不同。“旧范式”即“文献语言学”，早期的研究目的为“文献”代替了为“语言”。“新范式”表现有二：一方面是对符箓咒语等活材料的考察；另一方面是新的语言学方法的介入，从中探寻汉语史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在旧范式中，语言是文史的附庸，治道经语言文字的学者多为宗教学者、文史专家、考古学家，真正的语言学家寥寥。后来受到佛典语言研究的推动，不少语言学者转而注意道教文献，宏观上将道教文献视为语言研究的语料，微观上不以一字一词得释为目的，自觉运用语言学规律观照道经的词汇和语法，实现了语言本体的回归，大大改变了道教语言研究面貌，走上了“实证”研究的新范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语料库的建设，道教语言研究将朝着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方向努力。

作为中华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早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并且有不少外国（尤其是日本、法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国内的道教研究能取得今天的成果，除了本国学者的努力辛勤以外，频繁的交流互访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今后道教语言研究要想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还需要不断借鉴道教和汉语史这两个学科领域内的国内外最新成果。

道教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广阔而深远的影响，它既有不逊色于儒佛二家的经典文献，又有不断出土的道教文物考古资料提供新的证据，还有手印、符箓等“超语言”材料，这些都为道教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不竭的资源。我们相信，只要时彦同仁努力探索，互补短长，道教语言研究一定会取得长足进展。

Research Summary of Chinese Taoist Language in the Latest Hundred Years

Xiao Hong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Yuan Yuan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ver centuries, Chinese language study on Taoist scripture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former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to language research. It emphasizes on systematical theory research, but not forme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form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Compared with the Buddhist scripture language study, the research shows obvious weakness in a later start, less quantity and weaker foundation. Fortunately, there is still a bright future in subject development, material uti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Taoism; language ontology; collected Taoist scriptures

● 作者简介：萧 红，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袁 媛，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0CYY029)；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王 卡：《道教研究》，第143～144页。